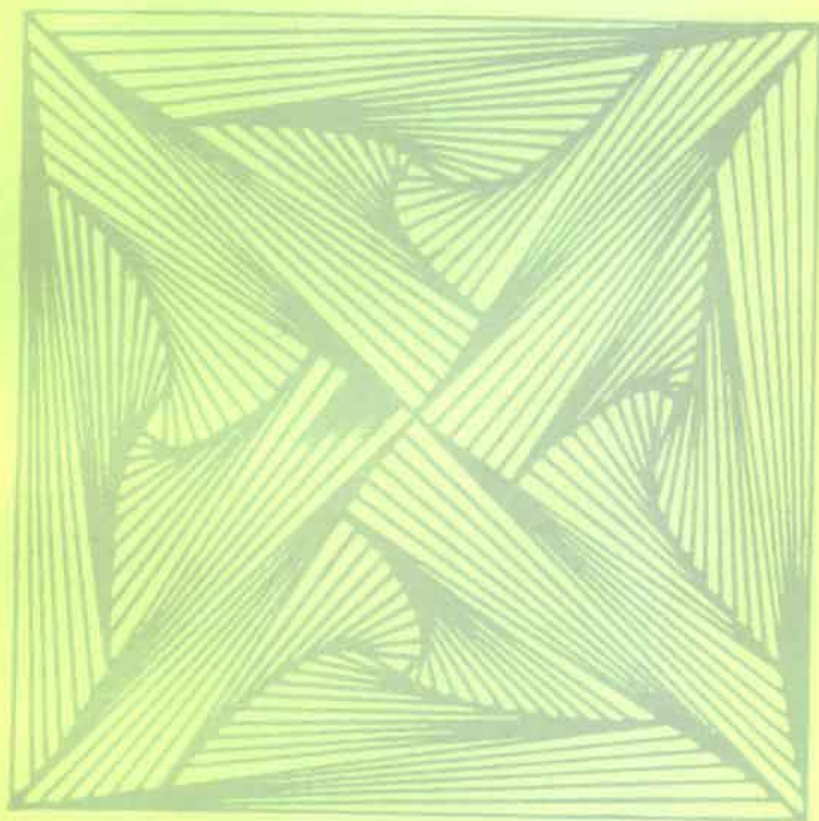


中国哲学四十年

杨春贵 主编



中国哲学四十年

(1949—1989)

主 编 杨春贵

副主编 万井容 吕英寰 陈瑞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英杰

中国哲学四十年
(1949—1989)

主 编 杨春贵

副主编 万井容 吕英寰 陈瑞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顺义县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9.125印张 496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035-0213-4/B·14

定价：8.60元

序

邢 贲 思

我们的共和国已渡过了四十个春秋，新中国的哲学也已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雨，而今双双进入了不惑之年。不惑之年是成熟之年。然而这成熟之年的到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要历尽沧桑，而且几乎无例外地要经过童年的幼稚，青年的困惑，而逐渐趋向成熟。回顾新中国哲学的四十年，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十分复杂的过程。

四十年的哲学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期至五十年代中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时期，就全国范围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时期。那时许多干部和学生所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开宗明义就是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一部漫长的、复杂的社会发展史被浓缩为短短的百把页篇幅和二三十学时的课程，内容当然不可能很展开，也不可能很深刻，但由于针对性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以后，许多人就接着学唯物论、辩证法，这对于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是很有帮助的。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主要是简单化。一部内容很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被归结为若干问题和几个观点。此外，是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这一时期几次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有从政治上批判得多、而从理论上分析得不够的简单化倾向。

第二个阶段为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较深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哲学来说是两个重大事件。一是1956年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二是1957年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要著作的发表。前者对于促进我国学术（包括哲学学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后者则推动了我国哲学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并且带动了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比起前一时期，这一时期的问题讨论深入得多，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外，无论是在认识论的原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历史唯物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还是在美学、伦理学、中外哲学史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的哲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繁荣、活跃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我们党在政治上犯了“左”倾的错误。1957年在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情况下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也涉及到了学术界，不但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且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把大量学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双百方针事实上已成为泡影，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的发展。从此，在哲学界也和在整个学术界一样，“左”的思想占居主导地位，从已知求未知的科学探索被中断，哲学经常充当“左”的政治的附庸，而丧失其独立的作为智慧科学的社会功能。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哲学发展停滞、倒退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禁锢、窒息的时期。这一时期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哲学已沦落成为现代迷信的侍婢，变成了“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理论工具，充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文革”理论的论证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被完全颠倒了。幸而这只是四十年哲学发展中一股逆流，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

告了这股逆流的终结。

第四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复苏的十年，也是哲学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开拓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哲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是真理标准的讨论。究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两个凡是”是真理的标准？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这场讨论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并且载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史册。这场讨论宣告了党在全局上的拨乱反正的开始，宣告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它为全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一种科学的精神同现代迷信、语录标准、僵化模式及其最新表现“两个凡是”等种种蒙昧主义实行决裂。这场斗争端正了我国的政治航向，使我国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我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不仅如此，它也为端正我国的学术航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基础上，一系列被颠倒的理论被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广大哲学工作者正是在这场讨论的鼓舞下，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科学成就，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探索了许多新的问题，并获得一大批成果。应当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我国的哲学状况最好的十年，是哲学摆脱困境、走出低谷的十年，也是哲学渐趋成熟的十年。成熟的标志就是哲学的自我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哲学的反思功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杨春贵等同志编撰的《中国哲学四十年（1949—1989）》以翔实材料，缜密的分析，再现了新中国哲学四十年的历程。本书采取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按照历史分期评述了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潮、哲学论著和哲学学术讨论，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四十年来我国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哲学发展的某些规律进行再认识，作出再评价。书中所总结的某些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不仅对我们认识四十年哲学的历史而且对我们用哲学的眼

光观察现实，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哲学是智慧的科学。一个不重视哲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哲学，把许多本不属于哲学的东西强加于它。使哲学非哲学化，并且把这种经过歪曲的哲学加以狂热地滥用，这是很危险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明证。因此，要想使哲学真正发挥它的科学的认识功能和巨大的价值功能，就必须把强加在哲学上面的非哲学成分清除干净，还哲学以智慧之友的本来面貌。这是四十年来我国哲学发展所证明的一条基本经验。

目 录

序.....	(1)
--------	-------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1949—1956)

第一章	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地位.....	(2)
第二章	思想文化领域几次大的批判.....	(14)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中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运用.....	(48)

第二编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6—1966)

第一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探索及其失误.....	(64)
第二章	经济建设中主观主义的泛滥及其教训.....	(82)
第三章	工农兵学哲学的兴起及其经验教训.....	(91)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99)
第五章	真理问题的讨论.....	(114)
第六章	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的讨论.....	(127)
第七章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	(144)
第八章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	(159)
第九章	对巴人、周谷城、冯定学术观点错误过火 的政治批判.....	(171)
第十章	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讨论.....	(185)

第十一章	逻辑学若干问题的讨论.....	(202)
第十二章	美学问题的讨论.....	(217)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

第一章	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泛滥.....	(237)
第二章	形而上学猖獗.....	(250)
第三章	实践论与天才论的斗争.....	(259)
第四章	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上层建筑决定论”.....	(271)
第五章	影射史学及其对中国历史和哲学史的篡改.....	(283)

第四编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上)

(1977—1989)

第一章	“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300)
第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再认识与社会主义改革.....	(310)
第三章	哲学体系、对象、功能的新探讨.....	(325)
第四章	唯物主义理论的新探讨.....	(341)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新探讨.....	(361)
第六章	认识论的新探讨.....	(378)
第七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探讨.....	(401)
第八章	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417)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新探讨.....	(436)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探讨.....	(459)
第十一章	自然辩证法的新探讨.....	(480)

第五编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下）

（1977--1989）

第一章	逻辑学的新探讨.....	（ 504 ）
第二章	伦理学的新探讨.....	（ 517 ）
第三章	美学的新探讨.....	（ 533 ）
第四章	中国哲学史的新探讨.....	（ 544 ）
第五章	外国哲学史的新探讨.....	（ 557 ）
第六章	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探讨.....	（ 572 ）
第七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探讨.....	（ 590 ）
后记		（ 602 ）

第 一 编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1949—1956)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头三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到1956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虽然目前对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有若干问题尚在进一步探讨和总结，但总的来说，我们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巨大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思维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哲学在中国这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们党自觉地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主观世界的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广泛地致力于意识形态的建设，特别注重人们世界观的转变，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

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如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发生某些过火和失误，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是，从全局看，七年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建设还是相当成功的。由于把宣传科学唯物主义规定为思想工作的“最根本任务”而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教育运动，以及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进取思想和社会道德风尚。经济发展较快，效益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较为协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改善比较明显。因此，正确总结七年的历史经验，再现这个时期哲学发展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 一 章

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地位

建国初期，我们党在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运动。这场启蒙教育运动，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入手，帮助人们清理了头脑里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旧的思想观念，树立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热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和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学习和宣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

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我国和指导地位，是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为了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逐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清除旧社会轻视劳动和轻视工农群众的剥削阶级观点，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因此，学习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是当时的迫切需要。

我们党向来比较重视学习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建议在干部教育中要学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他本人也很重视这方面的学习。1943年12月30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以后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又提到恩格斯的两篇短文，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另一篇是《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9页）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从延安以来就照着办了。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1950年又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页）他要求从猿到人讲起，以反对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很快就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机关到厂矿、学校、部队，都集中数月的时间较系统地学习社会发展史。当时

的学习教材主要是于光远译的《从猿到人》(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艾思奇撰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此外还有一些理论工作者为配合宣传教育所写的学习辅导材料，如艾思奇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莫乃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以及苏联教科书《历史唯物论》(米丁著，沈志远译)等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这个学习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教育。这个学习对于全国人民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反对和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提高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自觉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当时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学习了以下一些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是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当时以恩格斯关于：“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的思想为指导，强调学习社会发展史，首先必须抓住这个钥匙，通过大力宣传生产劳动在人类起源、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阐明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艾思奇在马列学院的讲稿的第一章便是“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世界”；沈志远在《学习》杂志第1卷第1期上《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一文中，首先就宣讲了劳动观点。说明劳动的观点在整个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广大理论工作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序列，从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三个方面，系统地宣讲了唯物史观关于劳动创造世界的基本原理，清算了鄙视劳动和劳动群众的剥削阶级思想，树立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总之，“学习从猿到人的目的是要打破许多人的旧的剥削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43页)

其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当时学习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其基本内容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

的产物；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心任务在于掌握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出它的发展线索，从而使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在建国初期，“学习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去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学习》第1卷，第1期，第6页）。

再次，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伟大人物只有通过群众的力量，按照历史本身的发展方向，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如果脱离群众则将一事无成。人民应当热爱自己的领袖，但不应有个人崇拜。当时在学习上述观点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1）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杰出人物以及工人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并着重批判了“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此外，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艾思奇曾撰写《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一文，专题作了讲授辅导（参见《学习》第1卷第3期）。1954年10月，他又发表论文，阐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学习》第10期）。总之，建国初期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国家观点。

在此期间，理论界还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争鸣。这主要表现在艾思奇与蓝莎、叶逸民关于历史观与非历史观的争论。蓝莎认为，宗教迷信只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用以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艾思奇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出“宗教神话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蓝莎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简单地称作“反动的邪说”，认为只要学习劳动创造人，就可以动员人民起来消灭剥削制度。艾思奇指出，这也是一种非

历史观，因为它“没有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劳心和劳力的分裂和对立也是必然的现象”。并指出，学习社会发展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制度和旧思想，而是要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明确创造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历史条件。（详见《学习》第1卷第2期）叶逸民发表文章不同意艾思奇对蓝莎的批评，和艾思奇开展了论争。（同上）此外，理论界还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实践证明，这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取得了成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这也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60页）学习唯物史观，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定义出发，而是从社会发展史出发，即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分析中去阐述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因而生动、具体、实在，适合于广大群众学习。从当时最有影响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大家通过学习，自觉清理了头脑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且激发了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无论个人或团体，都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二 《实践论》、《矛盾论》的重新发表

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于是，全国又出现了以学习“两论”为中心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学习社会发展史，宣传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教育，为清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唯心主义思想的流毒，扫

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的话；那么，“两论”的重新发表，则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并使得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从而进一步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我国的指导地位。

全国范围的学习《实践论》，是从1951年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重要社论的号召下开始的。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并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学术革命的工作将开辟新的历史的一页。”社论还号召大家真正领会《实践论》的深刻思想，并认真地将它转化为学术的实践，从而产生伟大的学术成果。3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题为《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社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的统一，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三篇重要社论为全国人民学习《实践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下，广大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以《实践论》为思想武器，来指导各项学术研究工作。如195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学文的《由〈实践论〉说到经济工作》一文。作者强调指出，要在《实践论》的指导下，努力去正确地认识与掌握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情况及其运动发展规律，从而比较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工作。同年3月1日，《新建设》杂志第3卷第6期发表冯友兰的《〈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一文。作者认为，《实践论》对于马列主义的另一个发展，就在于“它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